



重庆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 庆 文 史 资 料

第 十 七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三年四月

目 录

介绍一位渊博的学者和民主革命的战士

——马寅初老先生 许涤新 (1)

马寅初教授反对官僚资本的斗争 周永林 (6)

附：马寅初教授反对官僚资本的文章、讲演编目

怀念饶国模同志 钱之光 童小鹏^{（重）}刘昂 牟爱牧 (27)

蜀军都督张培爵 张泽孚 (35)

公孙长子辛亥革命时期的诗歌 王东伟 (72)

诗人吴芳吉 聂云岚 (89)

川剧《情探》的作者究竟是谁 李 丛 (95)

赵熙与《情探》 王抡楦 (99)

在卢作孚先生身边工作的时候 周仁贵 (104)

我所知道的沈夕峰 张西洛 (125)

太虚法师生平片断 唐文光 (138)

回忆民生轮船公司 童少生 (145)

宝元通的组织管理及其转向国营的经过

..... 黄凉尘 樊陶斋 李清法 (179)

介绍一位渊博的学者和民主革命的战士 ——马寅初老先生*

许 涤 新

马寅初老先生是我国第一位出国专门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严复往英国留学，早在马老之前。但是，严复学的是海军，他所翻译的著作，对当时影响最大的，不是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不是孟德斯鸠的《法意》，也不是亚当斯密的《原富》（《国富论》），而是宣传达尔文学说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我们应该肯定严复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方面的功绩；但是，如果从专门研究经济学来说，马寅初老先生是中国最早的学者。

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上，特别是价值论，他是皈依心理学派的边际效用学说的。在这个问题上，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生的我，同他是有区别的。但是，他是一位火热的爱国主义者。在二十年代，他的风行全国的《中国经济问题演讲集》（记得共有十二卷），讲的虽然是经济问题，而在这十二卷《中国经济问题演讲集》中，却贯穿着一根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红线。我从一九二八年起，从学文学理论转而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我就读了他的《经济问题演讲集》。我之初步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 本文是许涤新同志为周永林、张廷钰编《马寅初评官僚资本》一书写的《序言》。该书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会的一些经济问题，就是从马老的演讲集得到的。马老是我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老师。

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引起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加剧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破产。局势越来越恶化，而马老的爱国主义则越来越加强烈，他感到中国如果不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如果不同坚持进步的中国共产党合作，那就有亡国的危险。可不是吗？“九一八”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把整个东北侵吞下去；“七七”事变之后，它大举向关内进攻，把大半个中国踏在它的铁蹄之下了。马老同共产党过去是没有往来的。一九三九年间，他是重庆大学商学院的院长。为了使学生擦亮眼睛，他决定在重大设立一个政治经济学特别讲座，聘请中共和进步的经济学家去讲课。他首先找到沈志远同志谈妥这件事，志远到《新华日报》找我，把马老的特别讲座的要求告诉我。我在得到组织的同意之后，就请沈转告马老，接受他的邀请了。这个时候，正是马老大声疾呼，反对国民党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和反对国民党官僚资本大发国难财的时候。重大当局也反复在考虑他设立特别讲座的后果，因而没有立即加以实现。没有多久，蒋介石就派兵，把马老从沙坪坝重庆大学逮捕了。那是在一个上午，从马老住处到重大门口那条路的两旁站满了学生，他们忿怒地送别了被捕的马老。为了纪念马老的坚贞不屈，《新华日报》同许多进步学者和进步学生，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举行了一次“遥祝”马老六十寿辰纪念会，并在重大建立一座使人景仰的“寅初亭”。

马老被捕之后关在贵州的息峰集中营里，接着又软禁在重庆附近歌乐山家中，先后达四年之久。在这四年里，他是没有低下头的。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严重压力之

下，蒋介石被迫于一九四四年冬把马老释放了。但是，CC头子陈立夫根据蒋的意旨，命令重庆大学不得聘马老为教授，更不得聘请他为商学院院长。教授当不成，他只好按习惯向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投稿，但是，很快都被退回来了。周恩来同志知道这事之后，命《新华日报》记者到歌乐山（马老当时寄居在歌乐山他的女婿的家里）去访问，并把他的被《中央日报》和《扫荡报》退回的文章，带回《新华日报》。恩来同志要我先研究文章内容并提出意见，然后向他汇报，恩来同志听了我的汇报之后，又亲自把马老的文章看了一遍，立即通知《新华日报》编辑部全文在我们的党报上发表。从此之后，我们同马老便建立起良好的友谊来了。我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同马老来往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之下，疯狂地发动内战。在重庆的民主人士，在沧白堂和较场口先后举行的群众集会，都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暴力破坏。马老是积极参加斗争的。有一次董必武同志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邀请几位老先生举行座谈，马老在发言中强调：“反对压迫，反对内战，要求民主，我举双手赞成。不过，要唤起民众，要组织民众起来斗争，那是中共的事情，我马寅初只能单枪匹马，站出来干。”到了上海之后，他在“工商专科学校”教书。每当学生举行“反内战、反压迫、反饥饿”的示威游行的时候，马老总是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头，同学生一道振臂高呼，昂首前进。蒋介石国民党恨之入骨，那是必然的。为了保护马老的安全，我们在一九四八年的秋间，设法把他接到香港；又从香港把他送到解放区。

解放初期，马老是中央财经委员会付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付主席兼浙江大学校长。不久，改任北京大学校长。一九五〇年春间，当全国实现了财经统一，结束了国民党十多年遗留下来的

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他到上海来看我，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了。他说道：“国民党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由中国共产党结束了，我怎能不高兴呢？”一九五三年我国开始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每年公布建设成绩的时候，他总要发表热情洋溢的文章。

为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马老是经常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两件事，直到今日，还是使我不能忘怀的。

第一，是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的问题。现在回头来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是成功的。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旧中国，是没有什么工业的。轻工业还有一点，而重工业却连一点也谈不上。因此，那时大力发展重工业，是必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以一五六六个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六四九九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这个成绩，使我国国民经济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在当时的教条主义的影响之下，有的同志对于轻工业和农业，重视不够。马老根据当时情况，提出必须重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不能因为重视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马老的这一见解，直到今天，还是具有其生命力的。

其次，是关于人口问题。马老的《新人口论》的重要性，现在已经被大家认识了。大约在五十年代初期，他就在他的家乡——浙江，对人口的增长，做了调查研究，并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过快的意见。记得周总理在一次同马老的谈话中，曾经对马老说：“人口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你很担心，我也早在担心。”周总理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明确地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必须继续发展卫生医疗事业，进一步开展体育运

动，并且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以后连续提出几次。这证明，周总理对于节制生育的问题，是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明确地提出来的。但是，在当时左倾错误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周总理的意见，竟被所谓“人多热气旺”的“理论”，武断地压下去了。而马老呢？在那个无恶不作的康生的策划之下，受到了一场残酷的围攻；并且称之为“中国的马尔萨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康生还要进一步给马老扣上“资产阶级右派”帽子。由于周总理的极力反对，康生的这一计划，才没有成为事实。但是，他还在暗中把马老当成“内定右派”！在那时，马老是过了七十岁的人了。他并不因为年老而在“左”倾教条主义的迫害之下低头。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之后，“左”倾错误，还在一个时间里继续，马老的名誉因而没法恢复。到了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正确路线才得到实现。马老百岁大寿的时候，教育部聘请马老为北京大学的名誉校长；并在北京大学为马老举行百岁大寿的庆祝会。所有这些，都在证明：党和国家不仅对于马老的学术贡献，有着高度的评价；而且对于马老的爱国主义的崇高精神，有着高度的评价。马老是在生前得到平反，受到使人钦佩的荣誉的！

马老的著作很多，在经济问题上涉及的方面很广，我没有条件详细地介绍他的著作的价值，但是，对于他的爱国主义，对于他的使用经济理论作为表现其爱国主义的武器，我是有责任向读者们，向青年们，作介绍的。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夜半

在北京南沙沟宿舍

马寅初教授反对官僚资本的斗争

周 永 林

马寅初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同官僚资本的斗争，解放后提出的“新人口论”的主张，是他一生中最为光辉的篇章。他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从一个爱国主义者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挚净友、坚强的民主战士，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赞扬和尊敬。

在漫长的民主革命的岁月里，官僚资本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之一。中国官僚资本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而出现的。在国民党执政的二十多年中，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四大家族”成为中国官僚资本发展的最高峰。特别是在八年抗战期间，它急剧膨胀，独占了中国的金融机构，独占了运输系统，独占了对内贸易与对外贸易；凭借它们在政治上的特权，利用管制政策与恶性通货膨胀，囊括社会财富，剥夺工农大众，扼杀民族工商业。它们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因而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始终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纲领中明确规定：“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

农民所有；没收‘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它成为全国人民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行动纲领和努力以赴的奋斗目标。

但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下，它们对于官僚资本，亟力保护，对于它的罪恶活动，讳莫若深，不但不能揭露、抨击，甚至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报纸刊物上，连“官僚资本”这个词也不准提。稍有不慎，就会受到国民党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申斥、警告。因而抗战时期就连《新华日报》也不得不以“特种资本”或“××资本”之类的隐语来代替。直到抗日战争结束，经过毛主席来重庆谈判，国民党被迫召开了有共产党和其他各党各派参加的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下，在政协会议最后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上，不得不采纳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关于“废除现行统制政策，实行经济民主与企业自由”，“反对国内官僚资本，并防止外国独占资本操纵国计民生”的正确主张。为此，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新华日报》专门写了一篇社论《关于官僚资本》，指出：政治协商会议所拟订的《和平建国纲领》，提出防止官僚资本，是“近些年来在政府文献中郑重地把它举出，并提出防止的方法，这是第一次。”

二

马寅初教授于二十世纪初期，先后就学于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专攻经济学，获得博士学位。一九一五年，满怀富国强民、振兴中华的凌云壮志返回祖国。当时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面对现实，马寅初教授立志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探索中国财政经济的症结，寻求救国救民的药方。他拒绝了军阀、政客的拉拢，本着“一不做官，二不发财”的宗旨，毅然就任北京

大学经济系教授，全心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北大的教学工作。

一九二七年马寅初教授离开北京大学，先后去上海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并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立法院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及委员长等职。

当时的马寅初教授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还不可能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和羁绊。正如他后来所说，在这段时期“我不与共产党一起，我也写过文章批评马克思”。但马寅初教授仍然不失学者本色，他是以财政经济专家的身份参与立法院工作的。马寅初教授在立法院工作期间，热爱祖国，坚持真理，经常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提出了许多主张，同宋子文、孔祥熙等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辩。这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排挤和打击。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了。马寅初教授应邀参加了国民政府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座谈会。马寅初教授拥护抗战，反对妥协，同与会的其他经济界人士共同就战时财政问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特别是对于稳定法币币值，禁止私人套购外汇和避免资金外逃，发表不少宝贵意见。马寅初教授斥责那些大量套购外汇，以图保障个人利益而动摇法币汇率的“有钱者”的“不爱国的荒谬举动”，主张“予以相当惩罚”。

接着，由于战争失利，马寅初教授从庐山经过汉口向重庆转移。沿途看见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大撤退中，溃不成军，争相逃命，一片混乱。老百姓流离失所，呼天号地，惨不忍睹。而豪门大户却不顾民族危亡，巧取掠夺，大发横财。他极为痛心。一九三七年底来到重庆，一九三八年受聘于重庆大学，积极筹划创办商学院，亲任院长，又兼教授；同时与“国内经济学者共同研究”提

出实行“战时过分所得税”的主张；一九三九年在一次立法院会议上，他又根据调查材料提出一个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议案。凡此种种都直接触及到“四大家族”的根本利益。蒋介石为了把他挤出立法院，以派赴美国考察为名，要马寅初教授出国。马老洞烛其奸，公开表示“当此国难之时，决不离开祖国”。发表了“一不出国；二不买卖黄金美钞；三要逐渐脱离立法院，以保留自己的发言权”的严正声明。

马寅初教授在重庆期间，通过反对“四大家族”的斗争，逐渐对共产党有了一些认识。从此在他前进的道路上，向前跨进了很重要的一步。自一九三九年开始，他“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马寅初语）一九四〇年，他在重庆和香港的《大公报》、《工商日报》上连续发表了《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开办临时财产税以充战后之复兴经费》、《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为我国财政与金融唯一的出路》、《我们要发国难财的人拿出钱来收回膨胀的纸币》等一系列的文章和讲演，成为向“四大家族”公开宣战的战斗檄文。

马寅初教授在这些文章和讲演中说：“现在前方抗战，千万将士流血牺牲，亿万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而后方达官贵人，不但于政府无所贡献，反而趁火打劫，大发横财，忍心害理，孰甚于此！”

马寅初教授认为：“今日发国难财者，除商人外，尚有利用政治力量而发财者。此种行为，本非官吏所应有，故实行资本税，必须先自发国难财之大官始。”

马寅初教授公开痛斥宋子文、孔祥熙等“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在做生意时，以统治贸易为名，以大发其财

为实……至于这几位大官大买其外汇之事实，中外人士，知之甚稔。”他严正指出：“中国的几户‘大贪污’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之上，吾人以数百万同胞之死亡，数百万万财产之损失，希冀获得胜利，以求民族之快快复兴，决不愿以如是巨大的牺牲来交换几个大财神。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将吾人之经济命脉操在手中”。“要求政府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先从大官之中发国难财者入手，令其将用政治势力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

马寅初教授在一次演讲中，公开指责蒋介石：有的说蒋委员长是民族英雄，我马寅初认为他不够格，他只算“家族英雄”。他若做民族英雄，必须做到四个字：大一义一灭一亲！……

马寅初教授凛于民族大义，针贬时弊，敢怒敢言的精神，受到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蒋介石却“深为痛绝”，始而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或中央银行行长的高官厚禄为诱饵，遭到马寅初教授的拒绝；既而指使特务恐吓马老：“再行攻击，将以手枪对待！”马老当即驳斥：“所有指责，有实据可查，非讲不可。”继续四处发表演说。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六日，蒋介石终于下了毒手，公开以“派赴前方研究战区经济状况”为名，逮捕了马寅初。

三

马寅初教授被捕的消息震动山城。首先是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表示了极大的关注。《新华日报》以极其巧妙的方式把它公开出来。黄炎培先生对此深为骇异，当即写信请张治中先生设法营救。隔一天，张治中面告黄炎培，马之被捕，因他在重庆多次演讲直指孔祥熙、宋子文，被人告密。

重庆大学的广大师生，对于国民党反动派非法逮捕马寅初教

授的法西斯暴行，义愤填膺，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校内立即掀起了一个营救马寅初教授的怒潮，进一步秘密串连沙磁区各大专中等学校同学，准备于第二天举行游行到行政院请愿，要求释放马老。不幸消息泄漏，游行计划遭到国民党、三青团的破坏。接着，重大商学院的全体师生用个人签名的方式，向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发出《陈情书》，称颂“马师学者、专家，中国经济界泰斗，一片丹心，忧国爱民。值此强敌压境，国家民族处于危亡绝续之秋，奔走呼号，声嘶力竭，纯为救亡图存，肝胆可照。主张征收临时财产税，从经济学观点来阐述，实为国家财经困难救急之计，俾足食足兵，坚持抗战至最后胜利。……马师年届六旬，天寒岁暮，倥偬远戍，情何以堪？而数百学子，羔羊迷途，学何以进？故为马师计，为生等计，为国家民族计，涕泣陈词，恳请促马师返校主持院务”，等等。随即冲破蒋介石的直接干涉与阻挠，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三十日在重庆大学举行“遥祝”马寅初教授六十荣寿大会。请柬发出后，中共中央南方局送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同志新华日报社的寿联。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同志的寿联是：

寅初先生六秩大庆

桃李争华坐帐无鹤

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周恩来 董必武 邓颖超鞠躬敬祝

新华日报社的寿联是：

寅初先生六旬大典

不屈不挠征气性

敢怒敢言见精神

新华日报社敬祝

当时周恩来同志在苏联养病，对联是由董老撰拟、亲笔书写的。董老借用南北朝著名文学家庾信《小园赋》中“坐帐无鹤，支床有龟”的典故来祝贺马寅初教授健康长寿，赞扬马寅初教授临危不惧，坚持斗争的不屈不挠精神，给身陷囹圄的马寅初教授和正在营救马寅初教授的重大师生以莫大的鼓舞和有力的支持。

举行祝寿大会那天，沈钧儒、邹韬奋、潘梓年、张西曼等社会知名人士，和苏联塔斯社驻重庆代表，《新华日报》记者邵子南、鲁明、陆诒，《大公报》记者彭子冈，以及重庆大学的丁洪范、张圣奘、熊正纶教授等都到会祝贺。许多人在发言中热情赞扬马寅初教授：“言人之所欲言而不敢言”的崇高品德。

在祝寿会上，校外来宾和校内亲友纷纷解囊捐款，支助重大商学院同学，为了“崇德报功，敬老尊贤”，发起筹建“寅初亭”的倡议。后来冯玉祥还为“寅初亭”写匾，黄炎培为“寅初亭”题诗：

顽龙经岁困泥中，忙煞惊曹斗草屋；

报道先生今去矣，一亭冷对夕阳红。

把“援马活动”搞得热火朝天。

四

马寅初教授被捕之后，最初被关押在贵州息烽集中营附近山顶上一间孤零零的草房里，完全失去了与外界接触的自由，开始甚至不准看书，不准写信。同年八月转押至江西上饶集中营，终日单独关在一个小院子里。一九四二年六月因为战争关系，集中营向福建转移，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各方人士的呼吁奔走，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多方营救，才未将马老押解福建，而被移到广西桂林。最后于一九四二年八月才从集中营的监牢里转移出来。

马寅初教授从集中营出来后，并未立即获得自由，而是继续被软禁在重庆附近歌乐山大木堡五号住所。直到一九四四年冬天，国民党由于湘桂战线失利，和爱国民主运动的压力，反动当局才不得不在国民参政会上宣布，恢复马寅初等政治犯的人身自由。但另一方面又密令重大解除马寅初教职，其他高等学校不准延聘；密令《中央日报》、《扫荡报》等国民党报刊不准刊登马寅初教授的文章。从政治上、经济上给马老造成许多困难，妄图断绝马寅初教授的生路。

当马寅初教授在政治上和生活上最困难的时候，有的同志把马老“教书不成，投稿无路”的困境，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当即指示说：“马老是一位经得起考验的爱国主义者，必须给予支持。”决定《新华日报》刊登马老的稿子。从此，《新华日报》的记者经常去马老家采访，马寅初教授也经常参加《新华日报》召开的座谈会。有次董老和王若飞同志在曾家岩五十号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国是，马寅初教授即席发言说，组织群众，组织队伍，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事情，中共对这方面的工作是行家。我马寅初只会单枪匹马。但是，只要为了国家的利益，我是一定跟共产党走的。的确，马寅初教授在获得自由以后，用行动来实践他的诺言。他没有被国民党的其势汹汹所吓倒，更没有因为长期的监禁折磨而消沉。相反，一九四六年他给重庆大学一位同学题词，引用明代爱国诗人于谦的《焚石灰诗》，稍加改写：“粉身碎骨不必怕，只留清白在人间。”继续坚持同官僚资本斗争，并进一步投身于如火如荼的反对美蒋的民主爱国运动之中。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马寅初教授刚刚恢复自由不久，在重庆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第一次在

公开场合露面，发表了《中国的工业化与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演说。他大声疾呼，中国抗战十分之八九为农民子弟，他们才是“真正的民族英雄”。“我们在大后方既吃农民的米，又抽农民的子弟去拼命。吃的是鱼肉，穿的是丝绸，住的是高楼，坐的是汽车，扪心自问，觉得卑鄙不堪，有何伟大之可言？其不肖者反当存亡危急之秋大刮民财，大肆囤积居奇，狼心狗肺，可恨亦可杀”。“中国要工业化，就必须实行民主，必须发展农业，改善亿万农民的生活；要发展农业，就必须土地改革”。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马寅初教授在重庆市商会，发表了《黄金政策所表现之经济政策》的演说。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抗战时期一贯推行的黄金政策，再次阐释了他在抗战初期就提出的对发国难财者抽“过份所得税”的主张，针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独裁政策，公开提出了“民主国家要有政团，至少两个，一党在朝，一党在野。在野党监督在朝党，使之不能横行无忌”的真知灼见。指出：“现在中国政党可归为三个，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国民党假定代表银行家、工业家与地主，共产党则代表农民。现在大银行家、大工业家、大地主，几被一齐打倒，即本人为代表所打倒（之阶级阶层）已不成其为政党。”来说明黄金政策所表现之经济政策实为自杀政策的错误。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马寅初教授在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招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茶话会上，发表了《论官僚资本》的演说。他指出，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垄断上海纺织工业，以所谓国营的名义作掩护来发展官僚资本，扼杀民族工业。他说：“我们今天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只有想发展官僚资本，造成自己大家庭利益的人，才甘愿去走这条害国害民的危险道路。”从而提出：“今天要快快打倒官僚资本。”